

阳明学研究丛书

阳明所推行之「致良知」，由心之本体所生起和呈现，

并在日常生活中力行笃行，

并非是将修德工夫省顿从简，「致」内含「复」的意思，

致知的过程即是克服病痛，呈现良知的过程。

王阳明教育思想研究

余文武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

阳明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由贵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王阳明教育思想研究

余文武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

内 容 提 要

本书基于对王阳明原著与阳明学研究的现有成果,集中探讨了阳明教育思想方面的重要内容。重点陈述了阳明的学问事功与讲会活动、教育目的论、教育主张、德育思想、教育方法与教育内容,以及社会教育与蒙学教育。作者对于文献的理解多有新见,内容呈现亦有其内在逻辑,文字表述堪称简洁流畅。本书既可作为阳明学研究的参考书目,亦可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泛读课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阳明教育思想研究 / 余文武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12
(阳明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3-0054-8

I. 王… II. 余… III. 王守仁 (1472~1528) — 教育思想 — 研究 IV. G40-09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134560 号

阳明学研究丛书
王阳明教育思想研究
余文武 著

*

责任编辑 刘 立
特邀编辑 李双雨
封面设计 翼虎书装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http://press.swjtu.edu.cn>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成品尺寸: 140 mm × 203 mm 印张: 8.625

字数: 186 千字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43-0054-8

定价: 1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总 序

作为一位伟大哲人、大思想家，王阳明的一生既辉煌灿烂又历经坎坷，既声名卓绝又频遭谤议；他执著教席又以知兵名世，是一代儒师而又戎马倥偬，其“文治而后可以武功”，其“内圣而后得以外王”，把自主原创之“知行合一”的圣门宗旨贯彻落实到了极致。

学术界对王阳明一生经历之划分，有“二段论”、“三段论”、“四段论”诸说。阳明生于公元1472年，卒于1529年，仅存世57年，不可谓寿；但流恩泽被后世，不可谓不厚。1508年，阳明于贵州龙场大悟心学之旨，在把几千年中国思想之进程来了一大扭转的同时，将其一生之求索作了两分。此所谓“二阶段论”。日本之阳明后学尤重“龙场悟道”一段，更把龙场冠以“王学圣地”而景仰之；后进而在“二阶段论”之基础上，将“贵阳三年”从中抽取出来，作一独立之段落。贵州诸学者，无论是前贤还是时人，均把此三载细以咀嚼，复多考论，引以为豪，于是有所谓“三阶段论”。持“四阶段论”之观点者，有见于古今史家之著，其论甚丰，恕不赘言。

以此观之，所谓四阶段，皆以帝号名明：一曰成化，二曰弘治，三曰正德，四曰嘉靖。

从成化八年（公元1472）到成化二十四年（公元1487），阳明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在经历了许多苦难而有趣的童事之后，他立下了“学圣贤”乃人生“第一等事”的志向。

从弘治元年（公元1488）到弘治十七年（公元1505），是阳明的青年时期。在这期间，他一直在苦苦寻求成圣立德的方法与途径，但始终不得要领。他的心灵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依违往复，无所归依”。他的心灵时而表现得过于浮躁，时而又转变为极端的郁闷。他遇到娄一斋后，转辞章之习为朱子格致之学。他的确努力了，但因“格竹”失败，加上二度落第的挫折，他又动荡不安起来。这似乎是在到处寻找灵丹妙药，实为病急乱投医。这一时期，阳明的心灵的确处于浮躁与郁闷的交错状态。

正德初年，阳明开始步入他人生的最低谷。正德元年（公元1506）至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中年阳明度过了他最为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这也是他步入“不惑”和“知天命”的历程。在龙场（公元1508年），他克服了浮躁和郁闷，一下子找到了实现自己心灵和谐的根本办法。而且，他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是成圣立德的唯一途径。接下来，他决心要把这一实现个体心灵和谐的方法加以推广，推广到诸生，推广到群体，推广到社会，推广到国家，推广到天下。“知行合一”就是他最先寻找到的推广之法。于是，他开始在贵阳书院（公元1509）“始论知行合一”，这是他“知行合一”理论发展的最初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行合一”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修养功夫。他在离开贵州前往江西路过湖南时，曾悔惜在贵阳时对“知行合一”悟之待深，讲之待透。后来，他在与徐爱等诸生讲论“知行合一”时，开始把本体与功夫对接起来，“知行合一”渐渐有了本体的意味。从本体上的“良知”发出的“知”，当然是包含了“行”的；从本体上的“良知”发出的“行”，当然是蕴涵了“知”的。这是讨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论本身的展开路径。

只是到了晚年，即嘉靖元年（公元 1522）以后，“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通道、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传习录》中之《钱德洪序》）。这时候，王阳明“知行合一”论已进入成熟之境界，正如其在《答顾东桥书》信中所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话作一当代的阐释便是：认识真切地付诸行动就是实践，实践的同时又明白、精确地体察就是认识。认识和实践两者的功夫断不可分割。真正的认识是能够付诸实践的，不能实践就不能叫做认识。“知行”是可以统一在作为本体的“致良知”之上的。“知行合一”是一元的，而“知行”统一在“良知”之下也是一元的，这是阳明学说与主张二元论的程朱学说的不同之处。阳明晚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浙江，他对学生解答完所谓“王门四句教”后，就最后一次步入了他征战的“不归之路”。

本套丛书共有五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阳明先生的思想学说、事功和诗文进行了探讨和评价。其中，不乏联系现时代而抒一己之见者，倘有贻笑之处，还望大方之家见谅并予以赐教。总之，在王阳明“龙场悟道”五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发现并发掘出了他的丰富思想体系中极富当代价值的精神内核。把它加以积极地培育、施行、光大，其意义无疑是深刻而久远的。

王晓昕

2008年春于贵阳龙洞堡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学问、事功与讲会	19
第一节 阳明家世	20
第二节 学问事功	34
第三节 讲会活动	44
第二章 教育目的论	55
第一节 学为圣人	56
第二节 明人伦	68
第三节 学以去其昏蔽	81
第三章 教育主张	94
第一节 立志	95
第二节 勤学	101
第三节 改过	105
第四节 责善	109
第四章 德育思想	118
第一节 知行合一	120
第二节 致良知	132
第三节 四句教本义	144

第五章 教育方法与教育内容	153
第一节 教育方法	154
第二节 教育内容	165
第六章 社会教育与蒙学教育	178
第一节 社会教育	180
第二节 蒙学教育	195
结 语	206
附 录	210
答顾东桥书	210
答聂文蔚(第二书)	226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232
教 约	233
大学问	234
教条示龙场诸生	240
万松书院记	242
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244
重修山阴县学记	246
示弟立志说	249
示徐曰仁应试	251
客坐私祝	252
参考文献	253
后 记	267



导论 功业追先贤

阳明以远有被称作千古至圣、万世师表之传统社会精神偶像的孔子，稍近又有承接儒家绝续千年之道统、集宋明理学之大成者的朱子。而历史仿佛是要在明朝中期寻找一个能够厚德载物、尊崇不移的儒学接力手。朱学颓废在即，圣学时不我待；心学推陈出新，圣学时不我与。由此，这一位学名昭昭、武功赫赫的大儒责有攸归，扛起圣学振兴的旗帜，把儒学的内圣之道发挥到极致，将儒家的明伦之学诠释到顶峰。

明朝中期的许多有志之士很想冲破朱学的形格势禁，不想再做拘俗守常的虚假知识分子。明朝自武宗后，民困国贫、豺狗当道，忧时之士对于忘国之音颇为不解，找不到世风下滑的根源，于是便归之于人心之不正，而人心之不正又归之于圣学之不明。思想界的巨擘——阳明先生便应势而生，他通时达务、揣时度力，一面在学业中获得突围，找寻自己一生的志业；一面积极爬梳朱学的思想脉络，意欲重新评估它的价值，为圣学的开显行九转功成之工夫。这一切都为阳明赶超朱子提供了以镒称铢的大势。

一、回复到儒学正宗

阳明出生在素有诗书传家的余姚书香世家，他的祖父就曾

在故里设帐授徒，从事办学兴教、培育英才的志业，阳明从祖父的口讲指画中深受教益；阳明十一岁时其父命中头魁，随后跟随家人到京城问学，阳明的眼界由此得以拓宽，学识得以铺垫。他后来作为儒家重要思想家的鼎出问世，给予姚江王氏家门的渐滋化育以丰厚的回报。学者惯常将阳明作为弘扬儒学道统的圣人而推崇备至，同时亦将阳明开创的心学功业与朱子发扬的理学功业两相对照。由此，相隔三百余年的两位历史巨人，在对圣学与学圣的理解上便有了不解之缘。

儒家所言之圣学的本义，是相对于道德的本质，自觉地作道德的实践，最终建立功行圆满的道德人格，这是由儒学传统揭示的成圣成贤之路。圣学的关键在于内圣，即内在于个人，自觉地作圣贤的修养工夫。朱熹认为，道德的本本水源不在本心，道德的动力不在本心，而在观察客观事物而获得的知识之中。朱熹的观点一目了然，很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同。因为生活中人们实难依循自己的良知行事，需要经由学习与教化的方式来开掘人的潜力，将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道德人格也在渐滋化育中形成，这样的教化方式认同人的可塑性，为历代教育者所欣然接纳。而阳明认定，良知即是本心，本心即是理，它是知是知非的法脉准绳，不假外求。显然这是与朱熹不同的独出己见。

朱熹对《大学》爱如珍宝，他主张以格物穷理来磨练修养的工夫，这对于不能相应于道德本心的人来说，实是了不起的创举；而儒家素来重视人文化成的造就，比如《大学》的三纲领与八德目的理论指引，实是明示儒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力学笃行。在儒家内圣之学的感召之下，阳明依循儒学的一贯工夫，



走出了与朱子学不同的成圣之路。阳明学的“格物致知”，实则是体验生命自我真实化的过程，甚至可以说“致良知”是让本体明白、天理流行的真正工夫。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①

阳明所推行之“致良知”，由心之本体所生起和呈现，并在日常生活中力学笃行，并非是将修炼工夫省烦从简，“致”内含“复”的意思，致知的过程即是克服病痛、呈现良知的过程。可惜，这种反身内求的为学工夫，这种以“格物致知”通向人文化成世界的路径，并未得到历代教育的真正重视，世人不以为意、等闲视之。可是，阳明依循孟子性善论的再发现，不离儒学正宗的诉求路径，确实是语妙绝伦的。牟宗三曾就阳明学与朱子学有过一段精彩的评论，他说：如果能以阳明学的系统为纵为经，以朱子学的系统为横为纬。即从自性的本质为方向标，由正心诚意启程，兼之以个人的涵养工夫以及格物穷理的学习态度，即可达致成圣成贤，再而通达人文化成世界。^②

朱熹是研究阳明学不可避而不谈的关键人物。他可称作是新儒学理学集大成者，上承儒家绝续千年的道统，是宋朝以后八百年间儒学传统最权威的解释者，他受到朱元璋、康熙在内的历朝统治者的顶礼膜拜，他所集注的《四书》成为科举的准绳，其影响波及整个东亚各国。有学者称朱熹的世界观是前现

^① 传习录下。门人黄直录。

^②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9。

代化时代东方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由他所辑录的《近思录》和清朝张伯行辑注的《续近思录》,体现了新儒学理学的全部文化内涵,被学者尊奉为“六经之阶梯”、“圣学之津梁”,是近八百年来儒学的入门书籍。^①

朱熹曾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亲自主讲儒家经典著作,制定系统完备的制度章程,对后世儒学教育的积基树本,尤其是对书院教学的轨物范世领有金石之功。从《朱子行状》中可以窥见朱熹在教育上的躬耕践行与不世之功:

“其于读书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义,精研覃思,以究其所难知,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

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疏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②

朱熹还亲手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事接物之精要作详尽的表述。其间所列教育条目,不是出自儒学大师,就是来自《尚书》、《易》与《中庸》,“学规”体现了朱熹对于接续孔孟儒学的用功。朱熹的《四书集注》曾为知识分子的必修课,科举考试也将朱熹的言论

① 卷首语. 圣人圣书: 近思录.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5: 502.

② 黄干. 朱子行状. 周德昌编著. 朱熹教育思想述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5-16.



钦定为标准答案。仅从中国教育史的角度来看，朱熹的地位，当是继孔子之后最重要的教育家。学者曾经将理学的极盛与复兴两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命定为朱熹和王阳明，即通常所说的朱学时期与王学时期。那么，如何看待阳明对于朱熹在功业上的赶超之势？让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理学的发展脉络。

理学在南宋的时候演绎为以朱熹与陆九渊分别为首的两派，朱学向来以儒学正宗自居，并得到几朝皇室的宠信和统治阶层的拥趸。可以说从元朝到明朝的初年，朱学可谓是一枝独秀，而陆学则是草木萧疏。有学者指出明朝因是朱家的天下，朱学得以推重并不难以理会，以至于后来朱熹所注解的书籍风行天下，其教义几近成为国教的要言妙道。然而，朱子学说被推崇到了极端，它的沉疴宿疾就日益显露出来。后来的学者多认为朱熹所主张的“格物穷理”很有问题，照朱熹所说的去“格”尽世间万物的做法，假使一个人没有内在的统摄力，将所见所闻的世间万象都“格”一遍，到后来只能是落得一个支离破碎、瓦解冰泮，反而将不可偏废的修身养性整体忽略。再有，朱子学说由于深得皇室的被泽蒙庥，一般人都不能反对国教的要言妙道。于是朱子末流简单地将四书五经注解一番，以为深得儒学正宗的真传。清醒的思想家已经发现对朱学的极度推重，使得思想界少有敬陈管见与出新思维，而流为暮气沉沉、鼓馁旗靡的气象。

阳明曾经在游侠、骑射、道学、佛学中出入，但始终不能寻觅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定在，少年阳明的天空可谓惨雨酸风！他也曾对朱子学说顶礼膜拜，尤其是依寻朱子的教诲去格物致知，可最终是心灰意败、气断声吞。所幸的是，阳明的一生有

如越音一般顿挫抑扬，他深得陆九渊学说中“心即理”的真谛，他披沙拣金，剜山觅玉，并冲破朱子学说的藩篱，使得宋明理学在他这里起承转合、否极泰来。而更为庆幸的是，阳明的学术思想获得了在社会中存在的根据，这也是他赶超朱子的可圈可点之处。《传习录》中的“答聂文蔚书”一文，很生动地表现了阳明在提出“致良知”之后，对于他的功业胸有丘壑、见可而进。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福礼相寻于无穷也。仆诚赖天下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举，以为必由此而天下可得而治。”^①

阳明的一生戎马倥偬、执锐披坚，扶危定乱、躬先士卒，他最后病逝在征战而返的归途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可谓是躬耕践行的绝佳表现，又可谓是“知行合一”的最佳注脚。所以八十年前的学者宋佩章认为，王学在社会中得以存忘接续、得以风靡一时、得以在思想界领军，其根本原因在于王学的实践品格。^② 杜维明曾谓，阳明平叛立的功业堪称伟大，可是与他的学术成就相比竟黯然失色。阳明具有内在道德与外在功业俱臻至境的模范人格，正是在此意义上，历代学者由衷地称功颂德于他。诚如邓艾民先生所言，“他的主要功绩并不在于一时一地‘破山中贼’，而在于为更困难、更重要的‘破心中贼’创造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型塑了更为完善的榜样。他不仅创造了致良知的学说，而且践行了致良知的学说，成为

① 答聂文蔚。传习录中。

② 宋佩章。王守仁与明理学。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31：27。导论主要参考宋先生的著述。



封建主义的圣人。”^①

邹守益与钱德洪对阳明一生钟爱的讲学事业曾有过如下记述：

“当时有称先师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助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即全人矣。’先师笑曰，‘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全人’。”^②

“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曰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兢兢终身至于毙而后已。”^③

这些记述不应看做是弟子对阳明哲学思想的自信与褒扬，它实际显示出阳明一生的志业重心在于从教学学与嘉言善行，文章、政事与气节都不是先生的志业兴趣，他所起兴的书院与讲会，他遍及四海之内的弟子，他所掀起的民间教化的浪潮，均充分地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他的弟子徐爱这样形容他：

“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④

这是借用颜渊称赞孔子的言词，足以说明阳明在弟子心中所受到的尊崇程度。阳明的另一位弟子王龙溪这样评论他：

① 邓艾民. 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109-110.

② 邹守益. 阳明先生文录序. 王阳明全集下. 1569.

③ 钱德洪序. 传习录中.

④ 徐爱引言. 传习录上.

“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泽究生民而不宰甚能，教彰士类而不居其德”，“推荡出入于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①

这是将阳明的功绩、修养和授业推崇到极高的水平。阳明先生一生始终以讲学为志业，其最大之志愿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君勱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述，“阳明尝曰，今乎天之不治，由于世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为之唱焉耳。阳明先生以学术不明为天下致乱之源，故愿以道济天下之溺”。^②他的教育思想着力于赋予绝学以新面目，施与时代新精神，给予学子以新思想，它显示了一个伟大的、成功的教育家的气象，他的教育思想必定会成为教育学人永远的旨趣所在。

二、弘扬圣学为己任

阳明的一生，可谓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绝佳典范。无论是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探求救国之路的孙中山，也无论是教育家陶行知、徐特立，还是革命领袖毛泽东，都曾经认真钻研过阳明著述。当年日本僧人将阳明学说带到日本，一时间成为日本学人的最爱，它间接地促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阳明学说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转折点，其独成一家的“心学”体系不仅与程朱学派意趣迥异，而且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真正体现了“学贵得之于心”。他的学说的自出新裁，

^① 王龙溪. 刻阳明先生年谱序. 王阳明全集下. 1361.

^② 张君勱. 比较中日阳明学.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0: 88.



为封建社会后期异端思想的开启奠定了基础，成为离世后从祀文庙的一代先贤。余秋雨曾谓：“倘若把中国历史上集大成式的哲学家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王阳明的名字。由于他的哲学思想高超、警策、简明，又由于他的人生经历曲折、奇特、宏富，他在中国文化领域的知名度是其他许多哲学家无法比拟的。”^① 将阳明学视为中国儒家的最后一个高峰并不为过，他的超凡入圣，可称作是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他的伟绩奇勋与坎坷经历，他的立德、立功与立言，真正诠释了“真三不朽”的传奇人生。

阳明在明朝八股取士、读书人锁定死读永乐《性理大全》的云迷雾罩之中，对读书人的贫血病症有深切的感受和大胆的呵斥，是故，梁启超美赞阳明“是一个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② 的确，阳明能在程朱理学一统天下之时，挺身而出，用“心即理”的学说与之抗衡，以“知行合一”的理论与之论争，以一种无畏的气概去戳穿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无论是他的才高知深，还是他的肝胆过人，都是令人五体投诚的。

阳明一生均以弘扬“圣学”为己任，三十四岁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之时，便开始讲学授徒，直至五十七岁病逝。其间，五十岁时归省祖茔；五十一岁时其父王华去世，返家服丧。服丧期满之后，在余姚、绍兴讲学长达六年之久，暮年被委任总督两广军务。在他二十三年的讲学生涯中，六年在家讲学，十

① 余秋雨. 序//计文渊编. 王阳明法书集. 西泠印社, 1997.

②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东方出版社, 1996: 3.